

社会改造实践与五四一代“新人”※

——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研究

李培艳

内容提要：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以倪焕之为五四青年的个案，讲述了从五四到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倪焕之在教育、爱情与政治三个领域的奋斗实践与思想变迁。可以说，叶圣陶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回应了新青年群体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完整地呈现了时代巨变与知识青年的心灵变迁，特别是新青年所面临的时代困局。本研究在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中，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倪焕之教育革新实践、政治革命活动的研究，分析其主体意识内含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动能，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历史关联。

关键词：倪焕之 五四 大革命 自我意识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25.07.004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最初连载于1928年的《教育杂志》上，初版于1929年。小说追溯了从五四到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青年倪焕之在教育、爱情与政治三个领域的奋斗历程与思想变迁，被茅盾誉为新文学十年来的“扛鼎之作”。在茅盾看来，《倪焕之》区别于五四时期“千篇一律的恋爱小说”，以及大革命时期“宣传品式的革命文学”，以社会分析的视角展现了五四到大革命将近十年的时代现象与社会生活，具有文学史的开创意义。^①后续的《倪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编号：2024QQJH192）资助成果。

① 参见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号，1929年5月。

焕之》研究，无论是偏重于外部研究的政治社会性解读，还是强调回到作品本身、追溯倪焕之个人心灵史的内部研究，基本是在矛盾的评价思路下展开的。稍有不同的是德国学者顾彬与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倪焕之》研究。顾彬从自身欧洲人的文化立场与现代性视角出发，将小说《倪焕之》与欧美的现代性直接对接，将倪焕之的困境定位为“现代性的无家可归”与“民族文化整体感的丧失”，可谓抽离中国社会现实背景的“去历史化”与“去社会化”的解读，抽离小说文本生成时代的认识论的哲学化解读。^①竹内好的《倪焕之》研究同样偏哲学化与抽象化，但对这种内在的欧洲现代性立场具有一定的矫正与反思意义，他将中国文学本身定义为一种政治性的文学，侧重叶圣陶作为“本土作家”身上所蕴含的自然生发的文学属性，将《倪焕之》定位为与鲁迅小说等等的“内在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作品。^②

追溯倪焕之的奋斗历程，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文学革命、教育革新实践和青年自由恋爱，到五四、五卅与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参与，可以说，叶圣陶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回应了新青年群体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完整地呈现了时代巨变与知识青年的心灵变迁。倪焕之五四时期的教育革新实践与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参与，关乎新青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自我、五四启蒙的价值理想如何落实到乡土社会、五四青年一代转向革命的动能来源，以及新文化运动与大革命的内在关联等重要的思想与文化命题。茅盾虽然从社会分析视角高度评价了《倪焕之》对五四到大革命将近十年的时代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展现意义，然而，后续的《倪焕之》研究却鲜有从五四到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变迁中，对小说的时代性、社会性、历史性做出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成果，竹内好意义上的“内生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也甚少为研究者所回应。本论文试图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从五四到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变迁中，重新认识青年倪焕之的个人奋斗、社会实践与政治参与。一方面，从“劳动”与“风景”视角出发，对倪焕之的自我意识变迁的历程做历史化与社会化解读，分析其

① 参见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参见董炳月《“内在现代性”与相关问题——论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主体意识内含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动能，回应竹内好意义上的“内在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展开”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倪焕之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实践与大革命时期政治参与的分析，反思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历史关联。

一 劳动、新生活与塑造“新人”

小说《倪焕之》以青年倪焕之心怀教育革新理想，乘船奔赴上海周边小镇的一所高等小学任教拉开故事序幕。依据小说叙述，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开始，此时的倪焕之“感觉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等候在前头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称心满意的事业，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①在倪焕之看来，教师的工作不同于木匠做一把椅子、泥水匠砌一堵墙，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进而生发了以教育为“志业”的意识。这其实是一个极具五四青春气质的叙事开端，倪焕之投身教育的“志业”选择在五四青年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据五四时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青年团体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发起的“关于学会会员终身志业”的调查活动显示，对于“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半以上的会员都选择“教育事业”。这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对青年群体的容纳能力有关，另一方面折射出的是从辛亥到五四，新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问题解决思路的根本性变革。即出于对民国政治的幻灭，在五四启蒙价值理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普遍将目光从政治转向社会，力求以文化与社会领域的革新培养“新人”，塑造新的政治基础。陈独秀在创立《新青年》之初，就将塑造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略，“致力于以文化方式激发政治”，创造新政治的基础。^②而教育无疑是新知识分子培养“新人”，实践这一新的社会改造主张的重要实践场域。

小说的前半部分以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追溯了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倪焕之在其任教的高等小学开展的一系列教育革新实验。其中，在学校开辟农场、对学生开展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新生活教育无疑是其教育革新实验的着力点。倪焕之将农场当作学校最有价值的新事业。在其眼中，生机盎然的学校农场不同于平常

① 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 参见汪晖《什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关于“五四”的问答》，《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的农村园圃，因为这是他们投入新生活的标记，孕育着“一种植物的生活史”、“生命的奥秘”和“万物的消息”，“满储着天真的意趣与劳动的愉快”。^①农场可谓教师、校役和学生共同劳动、研究、游息、享乐的地方，既是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展开之地，也是倪焕之教育革新理念的集中体现。因为，在他与蒋冰如看来，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生活实验。这一理念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则体现为“读书”与“劳动”相结合的新生活实验，即通过种田等劳动能力的养成，一方面实现游戏与功课、学习与实践的合一，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处理事务、应付社会实际生活的能力。而且，倪焕之将学校理解为一个小的社会模型，有着明晰的打通学校与社会区隔的意识，他认为在常规的教育设施之外，学校还应该设有图书馆、疗病院、商店、报社、工场、农场、音乐院和舞台等。这一打通学校与社会区隔的教育主张在五四时期颇为流行，例如青年毛泽东就极力主张打破学校教育的封闭性，主张“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认为学校“传授知识也须以其和社会生活之关系的密切程度衡量其价值”。^②

从开辟农场的教育革新实验来看，倪焕之教育革新理念的核心在于强调“劳动”对于“新生活”的塑造意义。如果说农场是倪焕之与学生们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之地，那么，“劳动”则是他们“新生活”的源泉。因为，在他看来，“劳动”与“人”的“自我”塑造息息相关。耕种的“劳动”有很高的价值，运用腕力，举起锄头，翻动泥土，不但可以使人“亲近长育万物的土地”，“尝味淌着汗水劳动的滋味，将看见用自己的力气换来的成绩”，而且可以使“人”的生活醇化、艺术化，进而达到“自我更新”的目的。^③这种对于“劳动”与“新生活”、“劳动”与“自我”关系的艺术化理解，在叶圣陶创作于1921年的一篇名为《苦菜》的短篇小说中有近似的更为细腻的表达。短篇小说《苦菜》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出发，叙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雇用农人福堂，将自家屋后的一亩多空地开垦为菜地种菜，在“劳动”中追求“新生活”幻灭的精神历程。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从他者视角到“自我”的亲身体

①③ 参见叶圣陶《倪焕之》，第83、111、114、83页。

② 参见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1页。

验，非常细腻地描摹了“我”与“农人福堂”完全不同的“劳动”体验。对于种菜，相对于以种田为本业的农人福堂的怠业与厌倦，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生活”的展开，认为“劳动是人生的真义，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的愉快”。^①在“我”的眼中，不但专注纯粹“劳动”的农人福堂像是一架机器般有着“和谐与调匀”的美感，亲身的“劳动”体验更是让“我”感受到了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完满体验。叶圣陶在小说中写道：

我踏在已检去砖瓦的松软的泥土上，鞋帮没了一半，似乎踏着鹅绒的毯子。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腔，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蛰伏着，这回经了翻动，它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钻；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裸露着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钻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杂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他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

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移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说。^②

在叶圣陶的笔下，土地意味着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的生命源头，人在“劳动”中接触土地，重建生命感觉，获得新鲜而快适的存在体验。同时，全身心投入的“劳动”使人忘却时间的流逝，以及主体的一切思虑和情绪，人与自然万物重新融为一体，达到“力就是我”“我就是力”的身心合一状态。作者对于“劳动”历程的描写渗透着西方泛神论与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色彩，如果做一点理论的延伸，“劳动”近于一种“艺术的生活”，蕴含着艺术的创造与主体的自我更新动能，人在“劳动”中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回归健康、纯粹、饱满的存在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可谓人抵达存在“整体性”的一种途径，人在“劳动”中重新成为“人”，成为“新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被叶圣陶定义为主体构建自我价值及“新生活”的源泉。

当然，虽然同样将“劳动”作为“新生活”的源泉，强调“劳动”之于生活的醇化意义，但倘若细加比较，《倪焕之》与《苦菜》中对“劳动”意义的强调各有所偏重。《倪焕之》偏于强调“劳动”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养成以及倪焕之

^{①②} 叶圣陶：《苦菜》，《叶圣陶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151页。

自我的醇化与更新,《苦菜》则侧重于强调“劳动”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克服。二者共同构筑了无政府主义“劳动观”的核心,即关联“劳动”与主体塑造,将“劳动”作为知识分子自我塑造与塑造他人,创造“新生活”的一种方式,其理论内核在于以“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创造一种实践性的、身心合一的主体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主体意识追求使青年倪焕之呈现出与五四时期“欧化”的新青年截然不同的主体特性,其自我意识并未呈现明晰的主体与社会张力。借用柄谷行人的“风景”与主体性发明理论来看,对灵肉一致的实践性自我的追求,使青年倪焕之的主体意识没有被“风景化”,保留了自然观察事物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抵抗欧美“现代”的本土化色彩。^①

为了反思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质疑文学上的西欧中心主义,柄谷行人在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曾提出了著名的“风景之发现”理论,“风景”成为反思文学作品中主体性发明的一个重要隐喻。在他看来,日本现代文学自明治二十年代发生时起就存在一种认识论的“颠倒”(现代性的认识装置),这种“把曾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这样一种颠覆,称为‘风景的发现’”^②。“风景之发现”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人们开始忽略“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将“现代”“文学”“作家”“自我”“表现”等都视为不证自明的东西,忽略历史性,将西方的“文学”概念当成普遍的先验性概念,因此,“文学”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被遮蔽。更为关键的是风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风景”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这不但导致了日本现代文学自发生就丧失了自然观察事物的视角,而且致使文学背后的主体意识被“风景化”,丧失政治能动性。

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遵循近似的语言、文化、文学与政治逻辑。从发生的本源来看,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同样基于政治性的挫折,从相关话题的展开方式来看,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同样始于言文一致运动,新文学的发生、戏剧改良、小说的

① 这一说法源自日本学者竹内好对于《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参见董炳月《“内在现代性”与相关问题——论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②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作者序(1991年)》,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兴起等同样是在一个共时性结构中存在的议题。而且，从早期新文学创作到创造社等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同样存在一个从自然生发到制度性确立的历史过程。因此，柄谷行人的“风景之发现”理论对于反思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照意义。而由早年的教育和创作履历来看，叶圣陶可谓新文学最早的一批创作者，身处中国现代文学“风景之发现”的现场。在“劳动”视角之外，借鉴“风景之发现”理论观照《倪焕之》及叶圣陶早期小说中的风景^①描写，进而反思青年倪焕之的主体状态，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叶圣陶可谓写景高手，在小说前半部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中，伴随着倪焕之个人化视角下的乡村教育实践，有大量的风景描写，细读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倪焕之》中的风景描写呈现出与“风景之发现”完全不同的建构逻辑。仅选择两处为例：

窗下是校里的园地，种着苕菜。园墙之外，迤斜地躺着一条明亮的小河，轻风吹动，皱起粼粼的波纹。一条没篷船正要出发；竖起桅杆，拉上白布帆，就轻快地前去了。河两岸是连接的麦田。麦苗还沉睡着似的，但承受着朝阳，已有欣欣的意思。田亩尽处，白茫茫一片，那是一个湖。几抹远山，更在湖的那边，若有若无，几乎与天色混合了。^②

焕之四望云物，光明而清鲜，一阵暖风吹来，带着新生、发展、繁荣的消息，几乎传达到每一个细胞。湖那边的远山已从沉睡中醒来，盈盈地凝着春的盼睐。田里的麦苗犹如嬉春的女子，恣意舞动她们的嫩绿的衣裳。河岸上的柳丝，刚透出鹅黄色的叶芽。鸟雀飞鸣追逐，好像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几簇村屋，形式大体一样，屋瓦鳞鳞可数。住在那些屋里的人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看见春天降临，大地将有一番新的事业，新的成功，他们也欢欣鼓舞，不贪懒，不避劳，在那里努力工作着吧。^③

① 借用学者柄谷行人对风景与带引号的“风景”的区分，此处及下文不加引号的风景区指的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客观风景（自然景观）。

②③ 叶圣陶：《倪焕之》，第35、85页。

诸如此类，以叶圣陶五四前后任教的角直古镇为原型，小说前半部分随处可见此类风景描写，透过倪焕之审美与艺术化的眼光，从小镇乡土田园风光到生机盎然的小农场都笼罩在一种诗性的光芒里。倪焕之眼中的小镇自然、鲜活、朴素、明快、富有生机，校外的小河、河两岸的麦田与远山，以及河岸上的柳丝、新屋与飞鸣追逐的鸟雀，共同铸就了一幅万物有灵的生命画卷。而置身小镇自然风景中的倪焕之与可爱的景色朝夕相亲，保持了对小镇风景的原初自然感觉，以健康、纯粹、饱满的主体状态与大自然声息相通、同频共振。从主体与风景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是“不隔”的，保持着一种和谐、有机的关联，人的主体对外部世界始终保持一种“敞开”状态，自然地融入风景。对于倪焕之而言，小镇的风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观而存在，其感知到的是风景本身，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概念”。因为，风景只是风景本身，而不是某种内在文学观念的折射。

叶圣陶五四时期的小说中有大量的风景描写，呈现出大体相类的文学特性。例如，在创作于1921年的短篇小说《晓行》中，小说中的风景与“我”之间同样保持着一种内生的整体性，在叶圣陶的笔下，水田里辛勤劳作的农人与空旷的田野融为一体，在“我”的眼中，“和平而轻淡的阳光照到田面，就象对一切给与无限的生意，一条田岸，一方泥土，和农人手里的一柄锄头，都似乎物质里面含有内在的精神”^①。在创作于1919年的短篇小说《春游》中，风景更是直接被赋予了唤醒主体的力量。小说叙述了“伊”在与丈夫的一次春游中，主体状态的改变。“伊”原本是一个衣食居息都以旧式家庭太太奶奶为榜样、凡事仰仗丈夫的家庭主妇。在春游中，面对周围一片青翠明亮的湖光山色，以及“只顾工作，都默不做声，仿佛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似的，又仿佛是几件机械在那里动”的农人，“伊”自我觉醒，并获得超越性的快乐。对于“伊”的这种细微的心理变化，小说中这样写道：

伊望着湖面，空阔光明，波澜微绉，那可爱的纹，决非人工可以织得成的。伊望着山，一派清气，象要渡湖送过来。山影倒入湖里，娟媚而

① 叶圣陶：《晓行》，《叶圣陶集》第1卷，第213页。

且庄严，象那司美术的神在那里凌波游戏。这个当儿，伊把已往的生活忘了，伊把当年几位太太奶奶小姐们的榜样，和盘踞脑海里的丈夫的威仪言论都忘了。伊把自己也忘了，伊只觉得眼前的景物自然，活泼，高洁，自己早和这自然，活泼，高洁融和了。伊那感想深印脑筋，容貌上便显出一种快乐刚毅的神采——从前不曾有的。^①

依据叶圣陶对“伊”的心理描写，“伊”的觉醒与风景密切相关，正是与高洁的自然的融合使“伊”忘记了“盘踞在脑海里的丈夫的威仪言论”，超越了过往的习俗，回归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存在。可以说，在短篇小说《春游》中，风景保持了原初的存在意义，成为人回归人之为人的存在本性的母体，风景与倪焕之新村实践中的“劳动”，有着相近的媒介与主体建构意义。人在“劳动”中克服思虑与情绪，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进而达到没有主客分离、身心合一的状态，而人通过与风景的融合获得的同样是这样一种超越性的本真状态。

因此，相较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所存在的“风景之发现”问题，在《倪焕之》及叶圣陶的早期小说创作中，风景与“主体”之间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建构逻辑，风景并非小说主人公的“自我”投影，不是被特定的文学制度创造出来的。风景的美不是通过对外部世界不关心的“内在的人”发现的，对于风景的发现并不建立于主客分离的认识论场域，相反，风景与主体之间保有一种内生的整体性，人对风景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自然的“敞开”状态，人在大自然中辛勤地劳作，“进行伟大的事业”。可以说，倪焕之的主体意识没有因为被“风景化”而丧失政治能动性，反而保持了艺术与社会实践的动能。

借鉴学者柄谷行人的分析思路，其实可以将倪焕之身上这种没有被“风景化”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追溯到文学创作背后作家的主体意识，或者说这一点同样可以在叶圣陶早期的文学观中得到反映。1921年3月5日至6月25日，叶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40则“文艺谈”，可谓对其五四时期文学观的集中概括。这40则“文艺谈”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谈论文艺家的人格修养问题。与柄谷行人所批判的日本现代文学的发生建立于主客分离的认识论场域相反，叶圣陶的文艺家的人格修养论背后所强调是一种与倪焕之在“劳动”实践中所体验到的身心

^① 叶圣陶：《春游》，《叶圣陶集》第1卷，第104页。

合一的主体状态同构的艺术家与造物同游、与万物同体，“小我不存，唯见大我”的有机整体性，且是与现实生活及民众保持真实的“触着”关系的有机整体性。^①叶圣陶早期的文学观并没有忽略历史性，将西方的“文学”概念作为普遍的先验性概念，相反，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西式个人主义与文学观在面对中国本土社会时所可能遭遇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安敏成所言，叶圣陶早年文艺思想中的“修养”意识所弥合的是“新的自我意识与本土社会之间的张力”^②。

透过风景视角所呈现的倪焕之身上自然生发的文学属性来看，叶圣陶从根本上不同于深受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影响的“后五四”一代“文学青年”，^③他最初的创作身处五四新文学尚未被制度化的发生期，写作没有被先验的文学概念所支配，文学观念的背后不存在西欧中心主义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在1943年，小说被翻译成日文时，竹内好将《倪焕之》定位为具有抵抗欧美“现代”的“内在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展开”的作品，认为《倪焕之》的小说作法并不是直接从日本或者欧洲学来的，小说的风格比通常称之为风土作家的老舍、沈从文等人的作品更接近“真正的现代中国”。^④因此，《倪焕之》及叶圣陶的早期创作对于回到起源，寻找区分于日本与欧美，建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学主体性，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反思与参照意义。

二 新村、工读与新青年的实践性自我

回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倪焕之在教育革新实践中所反复提及的“劳动”与“新生活”概念实际上是新村主义的核心概念，其所呼应的是新文化运动初期塑造“新人”的社会改造战略。新村主义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颇为流行的一种社会改造思潮，新村运动原是由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公社实验”运动，以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

① 参见叶圣陶《文艺谈·二十六》，《叶圣陶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② 参见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122页。

③ 对于五四学生一代与“后五四”“文学青年”一代在文学观念、社会意识及实践能力上代际差异的研究，参见姜涛《从“代际”视角看五四之后“文学青年”的出现》，《云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④ 参见董炳月《“内在现代性”与相关问题——论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论为理论内核，强调以“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进而实现非暴力的社会革新。无论是叶圣陶早期的文艺观，还是倪焕之的教育革新实践显然都有着很强的新村运动影响的痕迹。小说中遍布的对于“劳动”的新村式的艺术化理解，更像是给了当时流行的新村主义一个现实的乡土实验背景。倪焕之在学校开辟农场，和学生一起种田与做工，实验新生活，蕴含教育大众、塑造“新人”的社会改造色彩。将问题推进一层，回到1920年代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语境，倪焕之新村式的教育革新实践所反映的其实是新文化运动对于新青年群体的主体塑造意义。

如果在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里，追溯倪焕之的个人成长历程，他可谓科举废除之后，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新青年。众所周知，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士绅社会中知识精英上升途径的改变，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被边缘化。^①而且，新式学堂教育及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使“知识阶层从本土根源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剥离出来”，^②“丧失了传统文人与‘乡土’或‘地方’的联系和亲近感”，“在自我感觉上成为传统秩序的流放者”是新知识分子普遍的存在状态。^③传统文化整体感的丧失、群体身份与社会位置的改变、从政坦途的断绝，外加“专业化的知识阶层一时难以建立”，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成为被遗弃的、孤独的、无根的一群‘无行者’”。^④在叶文心看来，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特有的一种“疏离感”（estrangement），“在历史和价值割裂的地方，疏离感作为对存在于既有秩序之外的刺激的感知，出现在那些体验到传统权威丧失及过去地位和落魄现实间张力的人中”^⑤。

也正因为如此，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与新旧文化冲突中，苦闷、彷徨、漂泊，以及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疏离几乎成为五四青年主要的群体特性。例如，鲁迅、庐隐、冰心小说中所塑造的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谱系；青年瞿秋白在五四前后对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总第6期；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②③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汪晖《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④ 郭正昭：《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1918—193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2期。

自身“破产的士”的阶层自觉，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世飘零感与贯穿终生的“多余的人”的意识；郁达夫这样“在欧洲大战时期及其以后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和日本大正时期所谓‘文化主义’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后五四”一代“文学青年”，因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影响，自我意识中所呈现出的世纪末的颓废与现代人的苦闷色彩。^①对于新青年群体的这一特性，瞿秋白在写作于1933年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以“薄海民”（bohemian）概念对这一“小资产阶级流浪人的知识青年”群体的阶级特性做出概括。^②

然而，由倪焕之以乡土为本位的教育革新主张、对于小镇风景与风土人情的自然融入，以及在新生活实践中所呈现的外向社会实践动能来看，他显然与当时受新式教育影响，脱离乡土社会的“欧化”知识青年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在倪焕之的身上既没有明晰的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疏离感”，也没有浪漫派“文学青年”因自我与文学观念上的西欧认同所引发的“青年病”与“哲学病”。与日本现代文学中丧失政治能动性的“内在的人”不同，倪焕之虽经历了对辛亥政治的幻灭，但其真正的主体意识确立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相信思想的可实践性，是拥有新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实践动能的一代“新人”，其主体意识没有因为被“风景化”而丧失政治能动性，反而保持了外向的社会实践的动能。倪焕之的主体状态健康、纯粹、饱满，从风景与主体的建构逻辑来看，其主体意识并非确立于主客分离的认识论场域，无论在“劳动”，还是风景中，都保持一种外向的“敞开”状态，他自始至终对小镇的劳动者保持朴素的观照与平等的对话精神，不但忠于中国农民的感受性，而且对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民间文化与民众娱乐形式保持了极大的文化认同与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倪焕之更近于一个乡土社会的观察者与改革者。

同时，透过倪焕之的教育革新实践也可以反观新村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流行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村主义之所以在1920年代的新知识界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因为其为新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理

① 参见伊藤虎丸《创造社与日本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② 参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4页。

想,更在于其对知识与劳动关系的重新界定、对于“劳动”之于“新人”塑造意义的强调,为深陷新与旧、个体与社会冲突的新青年提供了一条革新自我、弥合主体与社会张力、实践乌托邦社会理想的路径。对于倪焕之的教育革新实践与新村主义及新文化运动的关联,叶圣陶在小说中其实是有隐性说明的。小说第二十章,作者用了全章的篇幅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状况做了专门概述,更像是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叶圣陶跳脱出小说叙事,从理论和思想层面对倪焕之乡村教育革新实践的回应。此章主要从文化思潮与社会实践两个层面概括了新文化运动对青年的思想启蒙与社会动员。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唤醒了青年的自我革新与批判精神,在求新与革新的驱动之下,“觉悟”的青年开始创办各种新式报刊,从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到政治制度,重估一切价值,批判“国粹”,研究西洋学术、民治主义与各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社会改造思潮的影响下,青年开始以“共同研究”为目的集会结社,从思想批判走向现实的工读实践。

对于北京、上海公寓里的青年学生而言,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不仅是思想观念的革新,更是尊重体力劳动的共同生活实践。据五四时期的社团资料记载,当时影响最大的青年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以及互助社、觉悟社、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青年社团都持相近的工读理念。“无论是乡村里的种菜劳动,还是城市里的工读实验,在一代激进的知识青年看来,都提供了传统的家庭、学校之外的别样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青年人可以共同尝试一种新生活的可能,一种自我改造的可能。”^①倪焕之的教育革新实践,无疑隶属于这一大的青年运动与社会改造思潮。同时,借用“体”和“用”这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叶圣陶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新青年群体的工读实践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系。所谓“体”通常指“本体”,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特征,所谓“用”通常指的是“功用”,是“体”的外在表现与表象。如果说重估一切价值的学术与思想讨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体”的话,那么,青年的集会结社与工读实践无疑属于新文化运动“用”的范畴,正是“体”和“用”共同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

在谈到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危机,特别是中国启蒙所依据的来自各个异质

^① 姜涛:《“菜园”体验与五四时期文学“志业”观念的发生——叶圣陶的小说〈苦菜〉及其他》,《励耘学刊》2010年第2期。

文化传统的复杂材料在面对中国社会的制度、习俗及各种文化传统所面临的问题时，学者汪晖在《预言与危机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中，曾提到“五四”思想命题的“悬浮”性特征：“‘五四’启蒙运动所推崇和宣扬的各种新思想主要是从西方搬来，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的独特性的分析，因此许多深刻的思想命题是‘悬浮’在人们所处的实际生活状态之上的，它们可能引起人们的震惊，却难以成为全社会持续关注的问题。只有当一种思想与它所分析的对象达到真正契合时，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结论。”^①结合倪焕之的教育革新实践，以及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互助社等青年团体的工读实践来看，新村式的社会改造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五四”新思想的这种“悬浮”性危机。或者说，新村主义的流行本身就蕴含着知识群体对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的反思。因为，在新村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中，启蒙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讨论，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实践，塑造青年人格的新生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城市中的工读实验，还是乡村里的新村实践都为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可以说“体”（“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讨论）和“用”（青年群体的工读实践）共同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新文化运动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

三 从“社会改造”转向“政治革命”

小说从第二十二章开始至第三十章，着重叙述了倪焕之从一个新村式的社会改革者，在“新思潮”的动员下，五四运动后逐渐激进化，从“菜园”到“十字街头”，投身群众运动，经历五卅，最后因大革命的失败而幻灭、死亡的生命历程。但因前后叙述的脱节，特别是倪焕之在大革命失败中的猝然死亡，小说的后半部分备受批判，这些批判主要围绕倪焕之主体意识性的脆弱性、20世纪青年文化政治的失败等问题展开。^②然而，倪焕之所经验的不过是

① 汪晖：《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② 参见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节录）》，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72～773页；钱杏邨《关于〈倪焕之〉问题》，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397页；王璞《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读宋明炜〈少年中国〉》，《读书》2017年第10期。

理想主义的新青年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普遍面临的精神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历史框架中看待倪焕之从“社会改造”到“政治革命”的自我意识变迁，特别是透过倪焕之的自我意识变迁来重新审视五四与大革命的内在历史关联。

实际上，小说第二十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抽象概括已经蕴含了倪焕之由思想走向行动的内在转变轨迹。在小说第二十章的结尾，借用“潮”这一比喻，叶圣陶在小说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新文化运动从北京扩散到成都、长沙、上海、广州等地，动员全国各地青年从乡村到都市，投身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历史现实。倪焕之的转变正迎合了这一大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因经济等现实因素，加上“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本身不足以从根本上应对启蒙危机，倪焕之的教育革新实验很快宣告失败，但它却在倪焕之从新村式的教育革新转向“政治革命”的主体激进化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因为新文化运动中所焕发的社会实践动能使倪焕之成为小镇五四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对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不但使倪焕之焕发了新的政治动能，而且使其开始意识到新村式教育革新的局限性，明白“要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进而在革命导师王乐山的影响下完成思想的转折，投身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可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对于青年的社会动员、对于青春活力的召唤，给了倪焕之等五四青年在1920年代中期转向革命的政治动能。

而且，在倪焕之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新青年自我觉醒的内在延续性。例如，由他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民众关系的持续思考来看，从新村式的教育革新实验中将“劳动”作为塑造自我与新生活的源泉，到五四运动中民众视角的获得与社会视野的打开，再到大革命时期修正个体的启蒙者姿态、重新审视自身与“民众”的关系，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民众”的一员，向“民众”学习，学习用“民众”的眼光看世界，倪焕之不断被时代唤醒并赋予新的能量。从新村式的教育改革到“民众的大联合”再到“有组织的革命”，从对知识与劳动关系的思考到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审视再到对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关系的反思，倪焕之的身上几乎涵盖了新青年群体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自我觉醒的主要面向——国家的自觉、个人的自觉、社会的自觉、民众的自觉等。倪焕之的主体边界不断拓展，其自我意识变迁并

非安敏成意义上的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更近于日本大正时期自我觉醒与国家的独立意识紧密结合的“政治青年”。^①

至于历来为研究者所诟病的倪焕之的死亡，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倪焕之所代表的其实是五四特有的青春与能量，无论在教育、政治，还是本文未曾展开分析的爱情领域，他所追求都是理想与现实相一致的生活，从最初的觉醒到大革命时期投身群众运动，他的主体意识始终是与时代的政治、社会变迁同构的。因主体与时代同构，倪焕之的死亡更像是对大革命失败的一种象征与隐喻。而且，《倪焕之》创作于1928年，可谓国民革命失败的历史“当下”，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革命话语权斗争中，革命与历史的新方向尚未明晰。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受制于自身的时代局限，倪焕之既无法分身为二，将自己的理想与青春客观化，进而超克幻灭，也无法像茅盾笔下的革命青年那样，“在政治悲剧中重新寻找和时代的进步关联”^②。

对于倪焕之身上的脆弱性，叶圣陶在1978年的新版后记中曾谈道：“他有良好的心愿，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找不到该走的道路，在那大变动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败了。希望破灭了，只好承认自己不中用，朦胧地意识到：将来取得成功的‘自有与我们完全两样的人’。中国革命得到毛主席的领导，终于成功了。”^③叶圣陶在这里所谈到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所依赖的“自有与我们完全两样的人”，无疑指的是青年毛泽东等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克服了知识分子弱点而成为政治家的一代新青年。虽同青年倪焕之一样历经新村运动的影响，然而，他们不但在五四时期养成了外向的社会实践动能，而且，面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不断革命精神，以大革命的失败为契机，逐步探寻出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并创立了一套中国革命特有的“胜利的哲学”。^④倪焕之身上显然缺乏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革命精神，面对急剧的时代变迁，呈现出理想主义青年的主体脆弱性。

① 参见伊藤虎丸《创造社和日本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161页。

② 王璞：《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读宋明炜〈少年中国〉》，《读书》2017年第10期。

③ 叶圣陶：《〈倪焕之〉新版后记》，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265～266页。

④ 参见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9～180页。

然而，在从五四到大革命的整体历史视野中看待倪焕之的主体变迁，追溯倪焕之从教育到革命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其从教育革新到政治革命的思想转折，所带来的是反思五四与大革命内在关联的重要契机。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大革命时期通常被作为五四时期的对立阶段来理解，例如自1980年代以来极富影响力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说等。实际上，透过倪焕之的个体奋斗与社会实践历程来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塑造的具有社会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被五四新文化所唤醒的青春与主体能量可谓其参与学生运动、投身大革命的内在动能来源。虽然，“20年代中期苏俄政治力量的介入给中国带来一种列宁式政党的思想、组织、行动方式，并直接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勃兴和‘大革命’的展开，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形态”^①，但是，苏俄政治社会力量的介入与影响是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青年群体的主体塑造与社会动员则是1920年代中期革命政治兴起的重要社会基础。正如汪晖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及其“运动”不但能够在社会基础上塑造新人（“青年”），还能够以文化的方式激发新的政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型的政党政治的产生，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我否定，而是运动本身饱含的政治逻辑的一个必然的延伸”^②。从“社会改造”到“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身从内部已经孕育了转向革命的基因。

[李培艳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 邮编 100006]

①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② 汪晖：《汪晖对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8页。